

老年人居住意愿满足问题与 社会工作介入策略^{*}

陈友华 庞 飞 曾 伟

提 要：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居与愿违”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老年人对其居住问题主观感受的特殊性和社会养老客观问题的普遍性之间存在错位，老年人的居住需求与社会可满足的条件之间也有脱节。若从客观方面对老年人居住意愿的合理性进行评价，老年人居住意愿的满足在现实中表现为合理性“居与愿违”、非合理性“居与愿违”、非合理性“居愿一致”等多维面向。社会工作应根据老年人居住意愿满足问题的不同面向及其具体成因采取相应的实践策略，以缓解我国养老问题。社会工作在参与应对我国现实问题的实践中，应培育实践自觉，推动其本土化与专业化发展。

关键词：居与愿违 合理性评价 社会工作专业化 社会工作本土化

一、老龄化背景下的老年人居住意愿满足问题

我国早在 2000 年前后快速步入老年型人口国家之列，且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有研究显示，到 2016 年底，我国 60 岁及以上的老人有 2.3 亿人，占总人口的 16.7%，65 岁及以上的老人有 1.5 亿人，占总人口的 10.8%，预计到 2050 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 3.5 亿人，老龄化水平达到 25%（Zeng, 2014）。所以，我国目前在将来较长的时间内，如何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都是重要的社会议题。老年人的居住意愿满足状况是体现老人养老需求是否获得满足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所提供的养老条件的重要指针。老年人的居住状况不仅包括客观的居住条件，还包括主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实现积极老龄化的公共政策及其机制研究”（主持人：陈友华，项目批准号：17ZDA12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观的居住意愿。无论是客观社会建设还是老人意愿，“居愿一致”都成为老人居住状况的理想追求。

已有对老人居住状况的研究主要从老人客观的居住条件（陆杰华等，2008）、居住模式（郭志刚，2002）及对居住意愿的影响因素（聂爱霞等，2015；郭志刚，2002）等方面的研究。已有国内与国外的研究发现，影响老人居住意愿的因素主要有：居住条件、居住模式、性别、婚姻状况、身体状况、受教育程度、经济条件、职业、居住区域与文化等，其中文化的影响较为明显。由此，有部分研究结合传统文化，在分析我国老人居住模式时，通过“空巢”现象来反映我国老人的养老问题（陈卫、段媛媛，2017；王志宝等，2013）。但从已有的居住意愿的研究结果来看（杜鹃，1999；张丽萍，2012；Morgan & Kiyosi，1983；罗根、边馥芹，2003），随着社会的快速变迁，老人越来越趋向于独居，而非与子女一同居住。由此，仅仅从“空巢”现象作为切入点，研究老人的养老需求及其居住意愿不太贴切，需要寻找新的切入点。

已有的研究一方面缺乏将居住条件、居住模式和居住意愿结合在一起的综合性研究，缺少整体的、总体性结论；另一方面，主要从宏观方面关注，无法呈现老年人主观居住意愿与居住现状的微观现实演绎逻辑，也无法体现老年人主观居住需求与社会满足可能性之间的契合关系。但明晰老年人居住问题的微观现实演绎逻辑，是社会各实践部门应对养老问题的关键。本文基于案例研究，在微观层面明晰老人“居与愿违”的基本类型及其成因，并从社会工作实践的角度讨论相关的应对策略。

二、研究设计与案例概况

（一）研究设计

本研究首先依据已有的研究文献，对可能影响老人居住意愿及满足的因素进行梳理，编制访谈提纲，然后选择江苏省经济发展较好、养老服务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的南京市某区和受城市化影响较大的镇江某农村两地为对象进行调研。调查采用滚雪球方式，从前一个访谈对象那里获得两个及以上的推荐访谈对象，按照立意抽样的方法对访谈对象进行筛选，最后根据访谈信息的获取情况，决定是否还需扩充样本。

访谈形式主要以跟老人聊天为主，以半结构式方式进行。记录方式主要通过录

音, 访谈结束后对录音信息进行结构化整理。在传统的访谈中, 一般是研究者和被访者二者之间的信息交流, 访谈者在对研究者提供信息的过程中, 由于受到各种伦理因素的限制, 导致提供的信息部分失真, 使研究者在短时间内无法获得较为真实的信息。为此, 本研究在访谈过程中, 加入了他人评价与信息反馈环节。在获得第一位访谈对象后, 采用滚雪球的方式获得接下来的访谈对象, 每次在访谈下一位老人之前, 都先从介绍人那里获得下一位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及对其的评价。在访谈结束前, 还从被访老人那里获得他对前一位访谈对象有关生活与身体状况的信息。当两位老人对内容反馈的信息不一致时, 引入其他熟悉访谈对象的老人进行补充, 以相同的信息内容作为研究者分析与判断的依据。研究者根据访谈对象反馈的信息, 结合其他老人对其生活状况的评价, 对其信息进行学理性分析和判断, 形成对访谈对象关于生活条件和居住状况的综合性客观评价, 进而与老人对自身的主观评价一道, 形成主客观两方面的评价信息。根据老人居住状况和生活评价的主客观契合度, 形成对老人居住需求合理与否的评价^①。

要说明的是, 需要本身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 具有极强的相对意义, 居住需求满足及合理与否, 不仅受到个人的价值观影响, 还受到政治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与文化氛围的影响, 由此很难建立客观、精确、统一的指标评价体系。在没有客观统一标准的情况下, 对老人的需求进行合理与否的判断, 具有一定的主观性。然而, 首先, 相似的生活环境, 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相似的生活条件, 加之长时间的交往互动, 为熟人之间的生活状况做出一定的客观评价提供了条件。在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看来, 语言本身具有追求真理的基因(哈贝马斯, 1989: 1), 即使主观评价也带有客观的成分。其次, 在本研究中, 对老人居住状况的客观评价并非完全来自他人的主观评价, 还加入了研究者在访谈过程中的逻辑验证与学理性判断。研究者借鉴多伊和高夫的做法, 把人的需要分为基本需要和中介需要^②(Doyal & Gough, 1991: 25), 认为满足基本需要是合理性需求, 而为满足基本需要以外的、超出社

① 由于被访老人很少有对其居住状况的所有内容都满意或都不满意, 大多为部分内容满意, 部分内容不满意, 所以, 研究则在根据多伊和高夫的基本需要的操作指标体系对老人居住需求进行合理性评价与判断时, 只能对特定的需求内容进行合理性评价, 而无法从总体上做出判断。对特定内容是否获得满足的客观评价则是研究者通过对被访老人、其他老人反馈的信息进行综合性分析后进行的判断。

② 多伊和高夫为了解决基本需要同时存在普世性和特殊性的问题, 将人类的需要放在实践层面进行思考, 在是否有利于提升健康和自主的框架下, 将人的需要进行基本需要和中介需要的操作化, 认为基本需要是普世的、具有共通性的人类需求, 中介需要是用来满足基本需要的物品、活动或关系的满足物的属性特质, 认为人类基本需要有赖于相互关联的中介需要的满足。

会实际提供能力的需要属于非合理性需要。由此，访谈对象提供的信息与评价、他人反馈的信息、研究者的逻辑验证和学理性判断，共同构成了访谈对象居住状况的客观评价及其居住需求的合理性判断。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老人居住状况客观评价的主观性。

访谈共涉及 25 位老年人，数量确定主要依据的是理论信息的相对饱和。已有的研究发现，虽然影响老人居住状况满足的因素较多，但主要的显著性因素主要有居住模式、婚姻状况、身体条件，居住地类型等（李建新、郭牧琦，2014；张丽萍，2012；曾宪新，2011；杨恩艳等，2012），本研究主要依据如上四个因素对访谈对象进行类型划分，按照不同类型寻求相应的访谈对象。访谈发现，城市老年人异质性相对较高，不同婚姻状况、身体状况、居住模式的老年人对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居住情况有不同的理解与感受，研究者在城市访谈了 16 位老年人后，感觉达到理论信息相对饱和后结束了访谈。农村老年人的同质性比城市高，其居住意愿及满意程度大致相似，研究者访谈了 9 位老年人后，觉得达到理论信息饱和后，终止了访谈。

研究者在访谈结束后对访谈信息进行了整理，首先将访谈对象按照不同地区进行编码（G 代表南京某区，J 代表镇江某农村），然后按照居住意愿是否被满足（主观/客观），以及已有研究中所揭示的影响老人居住意愿的要素（居住地、婚姻状况、性别、年龄、身体状况、收入水平、居住模式、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等）对访谈信息整理，以备分析。

（二）案例概况

本次共访谈了 25 位老人，其中男性 9 人，女性 16 人；城市 16 人，农村 9 人；已婚有偶（初婚和再婚）14 人，离异或丧偶 11 人；高龄老人（80 岁及以上）3 人，中龄老人（70~79 岁）13 人，低龄老人（60~69 岁）9 人。存在“居与愿违”^①的老人有 13 人，其中城市人数较多，有 10 人，农村 3 人。身体状况的评价分为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两部分，共有 12 人主客观评价不一致，其中城市有 7 人，农村有 5 人；在主客观评价不一致的老人中，城市老人倾向于低评自己的身体状况（自评

^① 访谈发现，影响老人居住需求的内容较多，很少有老人对其所有居住需求内容都满意或都不满意，大多都是对其居住状况部分内容满意，部分不满意，有的老人满意内容较多，有的满意较少。这里的“居与愿违”是指老人总体上对其居住状况的评价。

为差，他人评价为良），而农村老人倾向高评（自评为良，他人评价为差）自己的身体状况。详细情况见表 1。

表 1 被访老人基本信息

编号	居愿满足	居住地	婚姻	性别	年龄	身体状况 (主/客)	与子女同住	受教育水平	职业	收入水平 (元)
G01	否	城市	离婚	女	65	差/良	是	小学	工人	2000
G02	否	城市	丧偶	女	73	良/良	是	小学	无业	700
G03	否	城市	已婚	女	62	良/良	否	初中	工人	2000
G04	是	城市	丧偶	男	70	良/良	否	小学	无业	1500
G05	是	城市	丧偶	女	78	良/差	否	文盲	无业	800
G06	否	城市	已婚	女	65	差/良	否	初中	工人	1500
G07	否	城市	已婚	男	64	差/良	否	大专	教师	5000
G08	否	城市	离婚	男	63	差/良	否	中专	职员	3000
G09	否	城市	已婚	女	67	差/差	是	小学	工人	1500
G10	是	城市	已婚	男	72	良/良	是	小学	个体户	2000
G11	是	城市	丧偶	女	85	差/差	否	初中	无业	1000
G12	否	城市	已婚	女	70	差/良	否	初中	工人	2000
G13	是	城市	已婚	女	67	差/差	否	小学	个体	2100
G14	否	城市	已婚	男	69	差/差	否	高中	管理员	4000
G15	是	城市	丧偶	女	77	差/差	否	文盲	无业	700
G16	否	城市	已婚	女	68	差/良	否	大学	公务员	5000
J01	是	农村	已婚	男	71	良/差	是	文盲	农民	580
J02	是	农村	丧偶	女	72	差/良	否	文盲	农民	580
J03	否	农村	丧偶	女	70	差/差	否	初中	职员	1500
J04	否	农村	丧偶	女	78	差/良	否	中专	教师	3000
J05	是	农村	已婚	男	80	差/差	否	初中	个体	1000
J06	是	农村	已婚	男	76	良/差	否	小学	农民	600
J07	是	农村	已婚	男	82	良/良	否	文盲	农民	不详
J08	否	农村	丧偶	女	74	良/差	否	小学	农民	600
J09	是	农村	已婚	女	70	差/差	否	文盲	农民	不详

三、老年人的居留意愿与“居与愿违”

在访谈对象中，有一半以上（13人）老人的居留意愿没有被满足。在认为自己居留意愿没有被满足的老人中，城市所占比重高于农村，但无论是本次调查过程所

见还是已有研究（吴玉韶、郭平，2014：2）都发现农村真正的“空巢”比例高于城市，老人居住模式对其居留意愿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

访谈发现，较多城市老人的“独居”（没有跟子女居住在一起），并非实际意义上的独居。他们要么与子女居住在同一个小区，要么间隔几个街区，或居住在同一座城市。在研究者看来，这类居住模式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空巢”，甚至是部分城市老人最理想的居住模式，访谈中有6位城市老人的“居与愿违”表现为这一理想居住愿望没有被满足。

和他们（儿子、媳妇和孙女）住在一起很不好，最好是在附近再买或租个房子，不要跟他们住在一起，不自由，矛盾还多……住这里也不好，这个地方很不方便，买个菜要走好远，离商场也远，打车也不是很方便。（被访者 G09）

哎呀，没有办法，我身体不好，需要孩子们照顾，要不然单独住最好，不要跟他们住在一起。当然，不能离太远，在同一栋不同层，同一个小区，或隔壁小区，哎呀，反正就是不远不近最好……住这里唯一的好处就是看病买药方便。（被访者 G01）

相比城市，农村的“空巢”比例更高。据当地村干部反映，有的村落“空巢”达到了90%。访谈发现，农村老人的居留意愿和满足存在两大特点：一是农村的“空巢”多为真正意义上的空巢，大部分子女在城市打工，一年里少有团聚。部分农村老人理解的与子女共同居住，是住在子女农村的房子里，而非实际意义的共同居住。二是农村老人对其居住模式并不特别关注，但较为强调其住房的“硬件”条件，如是否宽敞，功能是否齐备等。另外，访谈发现，在精准扶贫大背景下，“贫困户”与“非贫困户”老人的居留意愿满足程度存在较大反差，有政府帮助建保障性住房的老人，其满意度较高；反之，满意度则较低。

还不错呀，比以前强太多了。公路到家，出行很方便，只要有车，说去哪立马就走。还有，现在的房子好啊，过去的房子啥也没有，还透风，冬天那个冷啊，现在的房子都宽敞，洗手间、洗澡间啥都有，和城市里一样。哎，还是现在好，国家还帮我们这样的困难人家建房子，过去哪有？（被访者 J02）

J02 当然满意啦，国家给他们家建那么好的房子，以前还不如我们家。但

人家现在好了，房子还有单独洗手间、洗澡间，和城里的房子一样。哎，现在还是要有关系啊。（被访者 J03）

从访谈中发现，老人居住意愿满足影响因素主要有三：一是居住地点，包括居住点的交通状况及周围生活配套设施；二是房屋条件，如房屋是否宽敞时尚，功能是否完备等；三是居住模式，即独居还是与子女共同居住。而农村老人和城市老人对这三个方面的重视程度以及具体要求也存在差异。城市老人比较关注居住地点和居住模式，希望居住地点附近的生活设施完善，如菜市场、医院、公园等社区配套服务齐全。农村老人则更关注居住地点和房屋条件，尤其是交通便利度，譬如是否靠近交通要道，是否邻近城镇等。

你问我对现在的居住状况满不满意，肯定不满意。现在我们家那口子身体又不是很好，家里的洗衣做饭都是我在做，还有买药，陪他看病，整天累得我不行，我身体也不好，实际上也需要人照顾。儿子经常出差，基本上没有时间照顾家里，媳妇负责家里的事，但是太不能干了，就在家带小孩，孩子现在都上学了，也不需要怎么照顾，就知道买衣服啊，美容啊，有时候叫她帮忙去买个药都没有时间，而且性格也不好……唉，要不是这里离菜场近，就搬到别的地方去住了，反正他们也照顾不上什么，这里去个商场，买个药还要坐3站地铁。你看我小学同学 G13，她那媳妇多能干啊，既上班挣钱，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对我同学他们二老也好。不说了，不说了，说多了都是火。（被访者 G12）

在我看来，其实 G12 不错了，她身体状况比我好，和老伴都是厂里的退休职工，老伴虽然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但是基本还能自理啦。她主要问题是性格太要强，跟媳妇关系搞不好，老嫌弃人家不工作，说吃她儿子的闲饭，其实她媳妇还不错啦，把家里打理得也很不错，她儿子经常不在家，在紧要关头，还是媳妇在跑……她们住的房子也不错，虽然是租的，是带电梯的，买菜也近、出门不远就是地铁，出行都挺方便，离公园也近，散步方便。不像我们，现在住的房子虽然是自己买的，但是没有电梯，特别是我这种腿脚不好的，很不方便，由于小区比较老旧，基本也没有什么服务，汽车都开不进去，买个药，打个针不是很方便，只有买菜还方便，就在小区后面。总体来说，我对目前的居住状况还是挺满意的，我觉得人要知足，不要对他人和环境要求太高……你看

G11, 今年 85 岁了, 老伴很早就走了, 身体比我还差, 一身的病, 风湿特别严重, 孩子们也都忙, 顾不上她, 一个人住在以前的老房子里面, 条件很不好, 3 楼, 房子很老旧, 不通风, 潮气大, 也不带电梯, 身体再怎么不舒服都只能自己照顾自己……收入也不高, 靠低保和孩子每个月多少贴补一点度日, 但她对现在的日子很满意。(被访者 G13)

访谈发现, 老人对其居住状况的满足情况, 大多通过居住需求的主观满足情况来描述。在描述过程中, 不同老人强调的主要内容不同。农村老人如 J02 和 J03, 首先强调房屋的功能条件是否齐备, 是否时尚好看, 跟别人家比是否落后, 其次才强调居住地点, 如是否靠近交通要道, 是否靠近城镇。但无论前者还是后者, 其符号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对于居住模式以及生活照料方面强调较少。城市老人更强调居住模式。其身体状况和是否有老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理想的居住模式。身体状况较好, 能够自理, 有老伴的老人都偏向独居; 反之, 身体状态不好, 需要人照顾, 没有老伴的老人则倾向与子女一起居住。城市老人对房屋的要求, 更注重其对生活的适用性, 如是否有电梯、社区服务及生活的方便程度, 而对房屋的符号意义关注较少。

从访谈情况看, 在主观方面, 所有老人对其居住状况都会有满意和不满意成分, 要么对居住模式不满意, 要么对房屋的地点、房屋条件不满意, 很少有老人对其现有的居住状况全部都满意的。但总体上, 对居住状况满意的老人, 农村人数多于城市。在客观方面, 城市老人的居住问题主要是所在小区多比较老旧, 配套设施落后, 社区服务相对匮乏, 无法较好地满足老人们的生活需求, 有的老人生活无法自理, 缺少必要的生活照料, 生活艰难。农村老人的居住问题主要表现在生活支撑条件严重匮乏, 真正的“空巢”致使家人的支持缺位, 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国家的保障和服务角色部分缺失。通过访谈还发现, 部分客观的居住问题因为普遍存在, “大家都一样”, 而在老人的主观感受中被淡化, 老人们客观承受着不便但未觉其存在, 例如农村老人对其无人照看的生活状态的普遍接受。而有的老人感受强烈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些个体化的特殊问题, 不是作为社会问题而存在, 如家庭关系的和谐与居住状况之间的矛盾、老人个性认知方面的问题等。还有一些老人感受到的“问题”虽然存在普遍性, 但超出了目前社会能满足的能力, 比如农村老人对房屋符号意义的追求。可见, 老人居住“问题”的主观特殊性和客观问题的普遍性、老人的居住需求与社会可满足的条件之间出现错位。若结合他人的评价对老人主观感

受到的居住“问题”进行评判，就会发现老人的居住需求有的合理，有的不合理。在了解老人本身的条件、所处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基础上，结合其他老人对其生活状态反馈的信息，对老人需求满足的现实性进行评价，则有现实和不现实之分。如访谈发现，G12 自身收入不是很高，家庭人手也不充足，身体状况良好，熟悉她的老人也觉得其生活状态不错，那么她希望得到子女全方位照料的需求就不太合理和现实。将老人需求的合理性评价与满足的现实性评价相结合，老人的“居与愿违”就呈现出多维面向。同样，如上所述，由于老人主观“问题的”特殊性和客观问题的普遍性、老人的居住需求与社会可满足条件之间存在错位，从老人居住意愿的满足情况来看，就会有四种不同的满足类型（见表 2）。

表 2 居注意愿的满足类型

居愿满足	客观评价	
	合理性	非合理性
居愿一致	合理性“居愿一致”	非合理性“居愿一致”
居与愿违	合理性“居与愿违”	非合理性“居与愿违”

访谈发现，部分老人总体上对其居住状况比较满意，并未表现出对其居住现实较强的不满足，但依据他们所反映的生活信息、其他老人对其反馈相关信息与评价以及研究者在访谈过程中通过观察等所获得的信息，发现他们生活条件低下，在现有居住状况下基本生活需求很难满足，亟待改善，表现为非合理性的“居愿一致”，如上文的 G11、J02、J07、J09 都是如此。若仅以“居与愿违”作为评价老人的养老需求满足状况，并以此为依据展开社会治理实践，一方面将无法精准地把握问题的要害，不仅会带来资源浪费，还会增加社会矛盾；另一方面部分真正需要帮助的老人被“居与愿违”的框架排除在外，脱离社会关注，从而不利于社会公正的实现。因此，社会工作在实践层面参与社会治理，提供相关养老服务过程中，要具体分析不同类型问题的原因，采取有针对性的实践策略，提升本土化实践的效果。

四、老年人居住问题的类型及其成因

合理性、非合理性的“居与愿违”，以及非合理性的“居愿一致”构成了老人

居留意愿满足问题的主要内容。无论是合理性还是非合理性“居与愿违”的老人，都对现实表达出某种不满。如若对这种不满不加以处理，无论对个体的精神健康、家庭的和谐，还是社会的稳定，都会带来不利影响。

（一）合理性“居与愿违”

访谈发现，部分老人主观居留意愿需求未被满足的问题和客观社会养老问题之间高度契合，其问题既是大部分老人都存在的，也是当前社会或家庭可以承受，仅仅通过自身努力无法获得满足，应当通过社会建设和家庭支持予以满足的居留意愿需求。从需求满足的现实性角度，研究者将这一类情况称之为合理性“居与愿违”，如生活无法自理老人希望与子女一起居住或住进社会养老机构的需求。

从个人最主要的社会支持结构来看，合理性“居与愿违”主要是个人以外的家庭、社会、市场和国家功能混乱与缺失所导致。众所周知，我国是从国家一元模式中衍化出市场力量，与政府相比，市场力量相对弱小；家庭受到计划经济制度化的解构、市场经济与计划生育的冲击与生育率下降的影响，对个体的福利提供能力受到较大程度的削弱，对个体的支撑能力，越来越多地附着在国家、市场和社会之上；社会是在国家发展市场经济，单位制部分功能被释放出来分散到个体所在的社区以后，在社区层面才获得一定的成长空间。但是，目前社区行政有余而资源不足，导致对个体支撑功能虚化。

在我国老龄化背景下，养老问题应该是目前社会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养老院和敬老院都有相应的经济或制度门槛，不是所有老人想进就能进的，大部分老人还只能依托社区，以家庭的形式来养老。老人的居住需求很大程度上也反映其他方面的需求，如生活照料、社会服务等。但目前社会层面能力有限，可做的事情不多，只能是有心无力啊。（被访者：南京城市某社区居委会主任）

访谈发现，社区是各类社会主体向老人提供服务的平台，但一方面，由于社区本身所拥有的资源有限，无法满足老人多方面、多层次的需求；另一方面，各主体在社区层面提供的服务大多各自为阵，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从而无法对个体进行有效支撑。因此，从福利多元的视角来看，合理性“居与愿违”所体现的养老问题更多表现为政府责任的缺失。长远来看，合理性“居与愿违”根本上是我国快速现

代化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阵痛。在现实层面，表现为以政府主导的市场、社会和家庭等各主体角色定位不准，责任划分不清，功能运行不协调，导致对老年个体生存支撑不力，从而导致了合理性的“居与愿违”。

（二）非合理性“居与愿违”

在访谈过程中，无论是研究者的学理评价，还是熟悉访谈对象的他人评价，都发现有部分老人一方面过度依赖社会与家庭，其理想的居住愿望超出家庭及社会的实际提供能力，个体在对自我生存的支撑中责任缺失；另一方面，在其目前居住模式下，基本生存需要得到了较好的满足，但仍然对现实表现出较大的不满。研究者将此两类现象称之为非合理性的“居与愿违”。在中国这个高度流动的社会里，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非合理性“居与愿违”较多地存在于现实之中。

案例：老赵（G07）和老伴都是某医院的退休职工，二老与儿子门对门居住。老赵说他成长在重组家庭中，生父在文革中被批斗致死。母亲改嫁后，老赵在新的家庭中遭到忽视。他说继父对母亲的家庭暴力深深地嵌入了他的生命历程之中。在2008年，他原来居住的小区被城市改造，在重新分配新房过程中，有位同事跟他情况类似，分到了3套房，而老赵只分到2套，并且新房的价格在后来翻了好几番，他对此严重不满。从其他老人的评价和他自己反馈的信息来看，老赵的老年生活处于相对较高水平，但他对现有居住状况仍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主要来自城市改造过程中的不公平分配。

对访谈资料分析发现，个人的认知及人格因素成为非合理性“居与愿违”现象的直接原因，其背后的社会因素，通过个体的认知结构与行为模式表现出来。如老赵（G07）对其居住状况的不满，是他所经历的历史时代、工作环境、政治氛围、家庭环境及现实问题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问题通过生命历程的方式，内化到他的生命之中，以人格的方式表现出来。所以，社会因素在个体认知与人格中的积淀表现为历史存留与现实的叠加，“居与愿违”只是老人对现实生活表达不满的一种方式。

然而，个体在历史与环境面前并非木偶。从发展心理学来看，个体能动性 & 主动性的发挥，同样对其人格塑造有重要意义。这一点可从黎某（J03）姐妹俩的案

例中看出。

案例：黎某（J03），女，70岁，丧偶，一个人在农村独居，还种两亩地。其他老人说她身体状况良好，但她自我身体状况评价较低。在访谈中，她总是说，自己养了四个孩子，都不孝顺，都对她不管不顾。她有一个大她三岁的姐姐，据同村老人反映，她们俩处境相似，姐姐比黎某日子还艰难一点，三个孩子都在南方打工，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回来，平时少有团聚。但黎某的大女儿在南京上班，还经常回来看她。熟悉他们两姐妹的老人说，她们姐俩虽然成长环境相似，但性格迥异，姐姐对其生活满意度较高，并未表现出对其生活较大的不满。据同村老人说，黎某孩子们都想把她接到身边一起住，但她不愿意，希望大女儿放弃在南京的工作，回到农村跟她一起居住，对她的生活进行照料，但大女儿并未如其所愿。同时，最近黎某向村里争取贫困户，希望村里给她建保障性住房没有成功，对此表现出强烈的不满。

从老赵和黎某的案例可见，非合理性“居与愿违”直观地表现为老年人个体的认知与行为模式问题，对老年人个体的认知与行为模式的干预与调整成为实践层面应对该问题的重要策略。

（三）非合理性“居愿一致”

访谈发现，有部分老人在现有居住条件下，其基本生存需求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日常生活艰难，但他们并未对现有的居住条件表现出不满，而是对目前的居住状况表示满意，研究者将此类现象称之为非合理性“居愿一致”，如G11。

与“居与愿违”相比，非合理性“居愿一致”对社会的不利影响相对隐秘，社会的不公平及其生活的艰难没有在当事人的意识层面得以表现。但若不引起社会重视，也将会对社会带来某些不利影响：一方面，虽然外界的残酷还未进入这部分老人的意识层面，但残酷的现实客观上一直在刺激和吞噬着他们，成为社会问题的隐性存在；另一方面，这一现象的存在，会使社会其他成员感受不到社会真正的公平公正所在，不仅影响社会公平性建设，而且还会让人感受到“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社会福利输送逻辑，进而激发人们向社会非不合理性地索取更多的资源，为社会带来不稳定的因素，损害社会制度的稳定，进一步恶化社会的公平

公正。

通过对访谈资料的分析发现，非合理性“居愿一致”是社会及个人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客观方面来看，导致合理性“居与愿违”的社会因素也是非合理性“居愿一致”的促成因素。主观方面非合理性“居愿一致”与非合理性的“居与愿违”的促成因素具有一致性，都表现为个人认知和行为模式问题，只不过前者过度强调个体责任，表现为其权利意识淡薄，而后者则过度依赖社会与家庭，个体责任缺失。

五、对老年人居住问题开展社会工作的应对策略与反思

在老龄化背景下，应对社会养老问题既是社会工作价值实现的重要领域，也是社会工作通过实践获得专业化和本土化发展的重要实践场域。但社会工作的养老服务实践效果并不理想。一方面，由于政府在社区层面的服务更多体现管理职能，而公共服务提供不足。在此背景下，社会工作无法通过服务项目嵌入公共服务体系中，开展相应的专业化服务。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所让渡的资源不足以及社会工作组织本身资源整合能力不强，导致社会工作在社区层面的服务效果不明显。因此，需要在福利多元的框架内进行社会工作养老服务的实践策略讨论。未来的社会工作需结合我国特殊的国情，采取“嵌入式”发展模式，同时以“社区为本”作为其发展的方向。虽然在发展中可能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问题，但针对老年人居住意愿满足问题，有必要基于我国国情提出一条老年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路径。

（一）合理性“居与愿违”的社会工作应对策略

应对城市老人合理性“居与愿违”问题，首先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向社区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社会工作嵌入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系统之中，展开相关工作。具体来说，政府一方面积极引导和培育市场对老人居住需求的满足，重点培育社会企业对老人生活需求的支撑；另一方面，通过向社会组织购买或提供养老院式机构照料服务对失能半失能老人提供支撑。社会工作可嵌入社会企业、社会组织和养老机构之中，提供相关的养老服务。由于老人多生活在各个分散的社区，社区应成为各种社会企业、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的平台。社会工作者在社区层面除了直接向

老人或老人家庭提供基本服务之外，还可整合和挖掘社会、社区、家庭和个人的潜在资源，形成对老人更广泛的支撑网络。

对于农村养老问题来说，可分别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予以缓解。短期首先可以通过国家专项资金，对乡村老人实行集中安置，提升开展公共服务的可能。与此同时，政府可向社会企业、社会组织或高校购买面向农村社会工作人员的培训项目，包括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和其他希望并有能力从事养老服务的人员。也可在农村开展机构养老的延伸服务，针对居住在农村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相关服务，由社会组织派遣或培训农村社会工作人员、特别是农村妇女提供相应的服务。另外，可以充分挖掘农村熟人社会的优势，通过邻里互助构建失能、半失能老人的支撑网络，政府向提供帮助的邻里给予相应的与市场价值相一致的物质补贴。从长远来看，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化解农村养老问题。政府在农民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加快相关制度变革，加速农民融入城市。社会工作嵌入政府提供的各项公共服务体系，为农民提供融入城市生活方面的服务。

（二）非合理性“居与愿违”的社会工作应对策略

由于非合理性“居与愿违”更加凸显个体人格和能动性，社会工作的介入与实践策略，应主要以个体化的方式进行，对老人的认知结构与行为模式进行干预和调整。

社会工作具体介入可以采用个案与小组工作两种方法。通过个案工作，引导老人加深对自身的认知，让老人认识到其意愿的非合理性，进而逐渐改变其行为模式。社会工作者还可以组建相应的老人小组，针对老人的居住现状及其意愿进行小组讨论，开展小组社会工作，通过小组内在压力、动力及其成长氛围，突破老人的固有思维，逐渐改变其认知模式和行为方式。老人认知的改变和行为方式的调整，可以从内在和行为的外部效应两个方面提升生活的满意度。

在农村，由于居住相对分散，难以开展相应的社会工作。但可以参考合理性“居与愿违”在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策略开展相关工作。另外，随着农村互联网的普及，可以借助网络平台，提供远程的访谈与咨询等个案工作服务。从理论上讲，借助网络平台，可以扩大城市优质资源的共享范围，提升农村老人的生活质量。在现实实践层面，其实施的可行性及操作方式还需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三) 非合理性“居愿一致”的社会工作应对策略

由于非合理性的“居愿一致”是社会和个体共同作用的结果，社会工作的介入与实践可结合“居与愿违”的实践策略，针对社会和个人两个方面开展相应的工作，但具体工作内容与应对“居与愿违”存在差异。如针对老人权利意识淡薄方面的问题，社会工作主要为老人提供权利意识唤醒服务，如在社区宣传老人合理的权利及义务；通过家访，向老人介绍相关权利观念，并介绍获取相关资源的途径和方式；在社区搭建相关活动平台，促进老人的社交，减少老人自我隔离等。但是，这一实践策略虽然满足社会工作的价值追求，但也存在构建社会问题的风险。这一做法的合理性将在下一部分进行讨论。

(四) 反思

本研究在访谈过程中，加入了对访谈对象居住状况的客观评价，以对老人居住需求意愿的合理性判断，作为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对“居与愿违”现实的多维面向予以分析。在对“居与愿违”多维面向的成因进行现实分析的基础上，从社会工作实践的角度，探讨应对策略。但是，在访谈中加入对访谈对象居留意愿的他人评价，这一做法是否符合科学研究的要求？是否符合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这样做会对社会工作的实践带来哪些风险？这些问题是接下来要讨论的话题。

首先，在访谈中能否加入他人评价？在访谈中研究者参与分析与评价，是否有违价值中立？笔者以为，第一，本研究客观评价并非完全来自研究者对调查对象的主观判断，也来自熟悉访谈对象的其他老人的评价，他们的评价，无论是否带有价值评判，对于研究者来说其评价即为客观；第二，在访谈中，无论是访谈对象自身对其居住状况的主观评价还是其他老人对访谈对象的客观性描述与评价，研究者都会引导他们对其评价进行解释说明，这些内容构成研究者分析的重要资料，成为逻辑验证的依据；第三，研究者根据相关专业知识，利用信息提供者的叙述对访谈对象的真实状况进行逻辑推断，减少研究者直观感受对判断的干扰；第四，客观评价是其他老人评价、访谈对象自我评价及研究者判断信息的综合分析的结果；第五，在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排斥价值渗入的自然科学研究范式在后现代社会学中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后现代社会学将研究者的价值纳入到了科学研究的范式之中，强调社会主体之间通过平等交流互动来认知社会和改造社会。另外，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并不排斥价值，其实践过程强调案主与社会工作者之间通过平等沟通与互动达到解

决问题的目标。因此，本研究加入客观评价这一维度，一定程度上融合了两种科学研究范式。

其次，以客观评价为基础的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是否存在专业权力压迫？一方面，无论是其他老人对访谈对象的评价，还是研究者对其信息的专业判断，都来自（或部分来自）主流社会的伦理道德和评价标准。用福柯的权力观来看，确实存在权力的压迫，包括主流社会和专业权力对边缘、弱势群体的压迫。但是，福柯的权力理论主要是将权力的隐性运行逻辑揭示出来，并没有给全社会指出一条可以反抗和祛除权力的路径，也许这本身就是不可能达至的目标。另外，福柯不仅揭示了权力对人性的压迫性，也揭示了权力对人性的实现、社会的运行及人类创造的积极意义，这是我们不可忽视的（庞飞，2018a）。社会工作在实践过程中，避免权力压迫，是由于社会工作服务目标是为弱势群体赋能，让其具备享受权利的权力，若在服务过程中存在专业权力压迫，会加重服务对象的无能感，不利于专业目标的实现（庞飞，2018b）。所以社会工作在专业服务过程中确立了助人自助、自决等服务理念，以减少专业权力的压迫及其问题构建等问题。但是，社会工作实践的实际运行，并非权力的真空，无论是对服务对象的赋能还是专业化的构建，其本身就是权力游戏。因此，在社会工作实践过程中，是否存在权力运作不应是关注的焦点，而应关注是否最大限度避免了权力的压迫性和最大限度发挥了权力的积极效用，是否通过对弱势群体的权力培养，具有反抗主流社会对该群体的过度压迫意义，从而减少了社会不平等（庞飞，2018b）。

再次，利用福利多元理论视角，来探讨“居与愿违”现象的问题成因，在加入客观评价标准以后，对“居与愿违”现象进行合理与否判断，本质上是在福利多元框架下，引入了个体责任，如此操作是否合理？福利多元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福利国家过度强调政府责任而破产的产物，将政府以外的市场、社会和家庭纳入福利提供的主体体系之中，来分担政府责任和负担。这一理论框架从本质上来说，还是强调社会^①对个体的支撑责任，而个体责任没有被纳入进来。相比政府、市场、社会和家庭，个体对自身的生命支撑是最具主动性和能动性的主体。从西方福利国家高福利难以为继的运行状况来看，将个体责任排除在福利体系之外的确值得进一步反思。同时，在实践层面，社会工作若运用福利多元的框架，过度强调社会责任

^① 这里指的是大社会概念。

而忽视个体问题甄别，将无法准确把握问题的成因，不利于社会工作的有效实践。社会工作在提供养老服务的实践过程中，对老人的需求进行合理与否判断，对提升实践效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最后，以客观评价为基础的社会工作专业实践，对非合理性“居愿一致”的老人提供权利唤醒服务，是否存在问题构建可能？如前分析，非合理性“居愿一致”对社会秩序的影响是隐性的，如果不妥善处理也会带来社会不稳定的风险。但如果对这部分老人提供权利“叫醒”服务，确实存在问题构建的可能。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尊重个人意愿的社会工作价值理念，存在将社会的、他人的、专业人士的价值观念强加给当事人的嫌疑，从而践踏了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价值理念，为服务对象带来新的权力压迫；另一方面，唤醒了老人的权利意识，若社会现有的社会条件无法满足其需求，反而增加了老人的人生痛感，降低了生活的幸福感体验，进而构建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威胁社会秩序。但是若从现代社会的权利理念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对这部分老人进行权利意识“唤醒”，是顺应现代社会发展理念与趋势，有利于促进现代社会建设和现代文明发展。另外，在社会工作实际操作过程中，只是对相关老人提供“权利”意识的唤醒服务，而是否需要接受为满足其基本权利需求的服务，仍然需要坚持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理念，尊重老人自身的主观意愿。

六、结果与讨论

老年人“居与愿违”在现实中普遍存在。在我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个体化趋势影响到社会中的每一个体，单独居住成为城市老人最普遍的理想居住模式，大量的“空巢”现象不能构成我国养老问题的依据，也不构成老人“居与愿违”的现实表征。老人居住意愿的影响因素不仅包括宏观层面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还包括微观层面的老人的家庭状况、身体条件、年龄、收入以及认知和人格结构。基于实践的需要，对老人居住需求内容进行合理性评价，呈现出老人“居与愿违”的现实多维面向。合理与非合理性“居与愿违”以及非合理性“居愿一致”共同构成了“居与愿违”现实的多维面向，三者都存在影响社会正常运行的风险，不同的影响因素导致了不同类型的“居与愿违”。社会工作应根据不同类型“居与愿违”的

成因采取相应的实践策略。社会工作在参与应对各类社会问题的实践中，实现其本土化与专业化发展。

社会工作专业所秉持的价值理念不仅是其专业目标和意义的基础，也是其实践方法和技巧的规定性来源。而社会工作起源于西方国家，其价值理念主要受到基督教思想、人道主义和福利思想的影响。对中国来说，社会工作属于舶来品，同时面临着专业化和本土化的需求，但二者在实践层面来说，是同一过程的两个面向（庞飞，2018b）。从价值对社会工作的意义来说，社会工作的本土化首先应是在我国特有文化背景下社会工作价值的本土化。

但是，社会工作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为缓解现代社会运行过程中的社会问题而生，其专业理念和价值以现代社会所推崇的价值理念为基础。在我国跟随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前提下，不可过度僵化地强调我国本土传统文化的内容，而否认社会工作的现代价值理念。首先，文化本身具有流动性，文化是人们生活实践的产物，在人们生活实践中形成，也在人们生活实践中变迁（庞飞、李程骅，2018）；其次，在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洪流冲击下，我国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基础多已不复存在，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结构已被冲散，部分文化内容构成现代社会发展可供选择和利用的资源，以新的形式嵌入现代化发展的历程之中，这是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运行逻辑（Baker & Hugh, 1979: 62）。在我国现代化快速发展背景下，过度强调传统文化的社会工作本土化与专业化操作只能是刻舟求剑。

社会工作价值的本土化与专业化，只能是在应对我国现代化发展历程中所出现的各类社会问题的实践中进行，在实践中得到强化与发展。这是一个动态的生成过程，而非对其内容僵化的实践化操作。社会工作在参与应对我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类问题，整合和利用我国传统与现代资源，构建其实践自觉（侯立文等，2017），推动其本土化与专业化发展。养老问题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这一问题为社会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实践自觉培育场域。

参考文献:

陈卫、段媛媛，2017，《中国老人的空巢时间有多长》，《人口研究》第5期。

杜鹏，1999，《中国老年人居住方式变化的队列分析》，《中国人口科学》第3期。

郭志刚，2002，《中国高龄老人的居住方式及其影响因素》，《人口研究》第1期。

哈贝马斯，1989，《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

侯立文、曹国慧、徐永祥，2017，《关于学术话语权建设的若干问题——兼谈社会学“实践自觉”的可能》，

《学习与实践》第12期。

李建新、郭牧琦, 2014, 《城乡老年人居住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老龄科学研究》第9期。

陆杰华、白铭文、柳玉芝, 2008, 《城市老年人居住方式意愿研究——以北京、天津、上海、重庆为例》, 《人口学刊》第1期。

罗根、边馥芹, 2003, 《城市老年人口与已婚子女同住观念与现实》, 《中国人口科学》第2期。

聂爱霞、曹峰、邵东珂, 2015, 《老年人口养老居住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行政管理》第2期。

庞飞, 2018a, 《为权力之“恶”辩护——权力的话语遁入与效用》, 《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 2018b, 《权利与权力关系视阈下社会工作的专业化逻辑》,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庞飞、李程骅, 2018, 《文化自信的多维认知与建构逻辑》, 《学习与探索》第3期。

王志宝、孙铁山、李国平, 2013, 《近20年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及其演化》, 《人口研究》第1期。

吴玉韶、郭平, 2014, 《201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数据分析》,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杨恩艳、裴劲松、马光荣, 2012, 《中国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农业经济问题》第1期。

曾宪新, 2011, 《居住方式及其意愿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人口与经济》第5期。

张丽萍, 2012, 《老年人口居住安排与居住意愿研究》, 《人口学刊》第6期。

Baker & D. R. Hugh 1979, *Chinese Family and Kinship*.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Doyal, L. & I. Gouh 1991, *A Theory of Human Need*. Basingstoke: Macmillan.

Morgan, S. Philip & Kiyosi Hiroshima 1983. “The Persistence of Extended Family Residence in Japan: Anachronism or Alternative Strate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1).

Zeng, Yi & Zhenglian Wang 2014, “A Policy Analysis o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Population/Household Aging in China.” *Journal of Population Aging*, 7 (4).

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责任编辑: 吴莹

MONOGRAPHIC STUDY

Social Development from Multi-Angle Perspectives

Host's Comments *Wang Tianfu* 1

The Asynchronous Dilemma of the Technical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 *Qiu Zeqi* 2

Abstract: By discussing various negative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s in our society ,the article alerts a social governance dilemma in the frontier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t reviews Jacques Ellul's theory of technological society and claims an upgraded framework based on Ellul's discussion to understand this dilemma. On the one hand ,the speed of technology iterations has been accelerating ,while the initi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in social governance lag far behind. W. F. Ogburn's culture lag cannot explain this phenomenon as it following a very different logic. On the other hand ,technology is initiated and applied not only for organizations but also individuals and society. Consequently ,existing social governance framework is incapable to cover emerging individualization ,sensitization ,and unpredictable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s.

Elderly People's Living Preference Satisfaction and Social Work Strategies for the Aged

..... *Chen Youhua ,Pang Fei & Zeng Wei* 27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ageing society, "living preference dissatisfaction" is a common social phenomenon for elderly people. It exists the mismatch between the particularity of elderly people's subjective feelings and the common social conditions ,and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the living preference of the elderly and the available social resources. By evaluating the rationality of living preference of the elderly by the available social resources and support for the aged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s living preference manifests multi-dimensions ,such as rational "living preference dissatisfied" ,irrational "living preference dissatisfied" and irrational "living preference satisfied" . Social work practice should adopt corresponding practical strategies to alleviate the problems based on the different causes of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s living preference. To deal with the aforementioned practical problems in China , social work should cultivate its practical consciousness and promote its localiz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Unfair Experience , Media Uses and Government Trust *Guo Jingwen & Sun Xiulin* 46

Abstract: The research uses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2010) data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unfair experiences on government trust and find possible adjustment mechanisms between them. The results show that unfair experience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government trust , and its effect on local governments is evidently higher than that o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addition , the uses of different media have a more complex effect on the above-mentioned mechanisms: different media uses , no matter traditional media nor new media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trust level of local governments but has effect on tha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use of traditional media increases the level of trust fo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hile the use of new media reduces it. In particular , the use of new media exacerbates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unfair experience on the level of trust o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Theory Revisited: A Case Study on the Labor Export in an Impoverished County *Yang Hongxing* 63

Abstract: Drawing upon ethnographic and documentary research methods ,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opportunistic rise of a labor export economy in an impoverished county of Central China. Whereas the developmental strategy of industrialization collaborated by the local county government and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team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d limited success , a labor export program incidentally initiated by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team eventually ended up as a prosperous society-driven labor export economy. Thus this study readdresses the theory of developmental state as well as its application in China's case as follows: (1) while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theory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tate's role of "top-level design ," economic success could be likely a positive "unintended consequence" of the state; (2)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theory overemphasizes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 however , the roles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society as well as market are generally neglected. The dynamic interactions among them actually have great impact on the patterns , trajectori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local development.

PAPER

Growth Coalition and the Dilemma of Consideration for Market Restructure: A Case Study of Truculence in a Provincial Private Oil Market in China *Lv Peng* 86

Abstract: One of the key factors for massive market restructure is whether stakeholders can achieve an